

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

◎蓝庆新 武 月

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形成的经济链条。自 2018 年以来，美国持续发起的“贸易战”严重扰乱全球产业国际分工，并破坏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和东盟海陆相连、比邻而居，分别为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之和超过全球五分之一，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超过 30%。双方加强产业链合作具备深厚的合作基础和明显的区位优势，顺应全球产业链区域化布局趋势。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政策沟通、产业转移、集群发展、供应链建设、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五方面内容。

一、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经济运行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对于维护我国产业链结构安全、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应对美西方对东盟战略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维护我国产业链结构安全。产业链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和保障，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砝码，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均引发全球产业链出现不同程度的卡点、堵点甚至断点。在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有助于从结构上优化、稳定我国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一是纵向扩展产业链。东盟从我国进口中间品、纺织原材料以及设备等，再出口成品至全球市场或将零部件返销至我国，可视作我国部分产业链的延伸；二是横向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参与区域分工能够随着产业发展，不断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强抗风险能力。2000 年以来，我国逐渐取代日本在亚洲的区域贸易中心地位，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三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东盟国家人力、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具优势，加强产业链合作能够提高协作效率，也能够规避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

（二）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全球分工模式下，国际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均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随着原有竞争优势的弱化，各国在面临相似的产业发展转型压力下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选择将部分产业向外转移，以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新一轮产业转移趋势息息相关，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有序推动产业转移有助于我国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一是发挥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必然要降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我国已经从人口优势转向人才优势，而东盟劳动力持续增长且价格低廉，适宜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我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二是形成垂直分工体系。向东盟转移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推动形成区域垂直分工体系，增加对我国技术和设备的需求，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推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放大技术创新效应。我国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中高端技术行业，与东盟中低端的发展结构形成明显差异，在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易对东盟形成技术优势，放大我国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带动我国产业升级。

（三）应对美西方对东盟战略竞争。随着东盟加工制造业的兴起，我国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更加密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达到遏制我国的战略目的，利用东盟国家对其产业链的依赖，鼓吹“去中国化”“去风险”，以战略竞争对东盟国家施加“选边站”压力，意图使东盟与我国产业链“脱钩”。近期，美国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将我国排除在外，实质是推动“印太”产业链“去中国化”，已基本完成“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谈判。尽管东盟国家与我国产业链“脱钩”并不现实，但美西方国家的干扰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我国与东盟原有的产业链合作计划。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强与东盟产业链合作可视为对美西方战略竞争的反制。发展是我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契合点。我国与东盟连续三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并且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加强与我国产业链合作对东盟更具吸引力，可起到弱化 IPEF 实施效果的作用。

二、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领域互利合作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加强产业链合作蕴含巨大潜力。

（一）发展需求互补提供合作契机。我国与东盟具有加强产业链合作的坚实基础和合作需求。一是双方经贸互补性强。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互补大于竞争，在装备制造、纺织、服装、轻工等领域融合不断深入，合作前景广阔，表现出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022 年我国与

东盟贸易增速快于同期我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增速，东盟对我国进口依赖度明显加深。二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遵循《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2025》的发展规划，东盟 2022 年在数字化转型、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深化区域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各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三是国际产能合作助力发展对接。我国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契合东盟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又可带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互利共赢。例如，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制造基地、文莱摩拉港等标志性项目相继投入使用。

（二）区域合作机制提供良好合作环境。“一带一路”倡议、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具有一定的功能互补性，为加强东盟产业链合作提供良好的合作环境。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凝聚合作共识。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地，也是重要参与者、积极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始终是我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力量源泉，对双方加强产业链合作形成强大的内驱力。二是 RCEP 拓展发展空间。中间品贸易占 RCEP 区域内贸易近 50%，RCEP 的深入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以中日韩为核心的高附加值产业链，融合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低附加值产业链，共同构建联系密切的亚洲区域产业链，极大拓展我国与东盟加强产业链合作的发展空间。三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放大合作优势。中国—东盟自贸区从无到有、从 1.0 版到 3.0 版，见证了我国与东盟互相之间更加开放的市场，零关税的制度安排催生日益增长的经贸往来，推动双方加强产业链合作，打造优势互补的产业链。

（三）交通互联互通提供合作支撑。我国与东盟海陆相连、比邻而居的区位优势为建立跨境交通网络创造条件，有力促进产业协作与相互投资，推动企业降低发展成本，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形成重要保障。一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活力增强。“双枢纽、多支点、多通道”网络发展格局高效连接我国西部地区与东盟国家，物流网络覆盖 1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65 个港口，形成铁海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等多元化的物流模式 [1]。2022 年外贸货运总值达到 185.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7% [2]。二是中老铁路开启泛亚铁路网建设新阶段。中老铁路目前是连接我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最为快捷的陆路通道，也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铁路的通车有力推进东南亚国家铁路互联互通进程，使庞大的

泛亚铁路网脉络变得更加清晰。三是中欧班列助力东盟拓展对外贸易通道。中欧班列发展南向线路，打通东盟与中欧、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铁路直达。

(四) 经贸合作区提供有力合作抓手。经贸合作区是我国与东盟加强产业链合作的重要平台，呈现内外联动的发展趋势，推动经贸合作区建设提质升级。一是数量不断增多。截至 2019 年底，我国企业已在东盟投资建设 25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二是模式不断创新。继我国和马来西亚 2013 年开创“两国双园”模式后，中国—印尼、中国—菲律宾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获批建设，标志着“两国双园”建设进入全面落实阶段，推动我国与东盟加强对国际分工合作的探索，为双方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提供新通道。三是领域不断拓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园、泰国数字园区和智能园区等项目相继落地，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成为建设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亮点。

三、对策建议

我国与东盟加强产业链合作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警惕美西方弱化我国全球产业链节点位置的战略意图。根据我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现状，加强产业链合作应重视政策沟通、产业转移、集群发展、供应链建设、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五方面内容。

(一) 加强产业政策沟通，避免陷入区域“低端锁定”。凝聚与东盟合力构建区域产业链的发展共识，避免相互竞争低水平国际分工导致区域价值链“低端锁定”。一是以推动双方产业升级为目标，高质量实施 RCEP 协定，加强政府部门对接产业规划、协调产业政策，结合各国经济发展需求将互补性较强的产业作为深化产业链合作的着力点。二是发挥民间经贸联络平台的作用，举办中国与东盟企业交流活动，了解企业参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前沿信息，把握阻碍深化合作的痛点和堵点。三是基于双方市场、技术、资源优势布局数字经济，建立常态合作机制参与东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新与升级，寻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在东盟的落地实施，重点加强 5G、智慧城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双方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共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二) 掌握产业转移战略主动权，警惕“产业空心化”现象。控制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和规模，避免因转移过快、国内产业升级过慢而导致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一是科学评估被转移产业在我国产业发展结构中的定位，确定转移必要性、优先级以及影响，遵循“先内后外”的转移路

径，同等条件下优先转移至国内中西部地区。二是建立产业链关键环节国内企业名单，注重保留核心技术的掌控权，保留技术密集程度高、资本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的高端环节，保留具有发展空间的产业集群。三是引导具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中国企业打造“全球母本工厂”，应对跨国公司在东盟开展“中国+1”的产业链布局趋势主动拓展东盟产业链条，增强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对区域和全球分工的参与度，持续提升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四是提高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继续承接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确保转移出去产业的产值能够被国内产业升级带来的增量产值抵消，在稳定制造业总体规模的同时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生产活动占比。

（三）推动产业集群“走出去”，激发产业链合作活力。注重“走出去”企业抱团发展，降低投资风险，调动企业参与产业链合作的积极性。一是探索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的“走出去”企业培育模式，发挥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在产业链合作重点领域培育一批“走出去”制造业集群，实现“走出去”企业集群式发展。关联当地上下游企业持续补链扩群，推动“走出去”产业集群优化升级。二是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切实围绕当地资源和发展需求展开招商，不断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为“走出去”企业参与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学习国际先进产业园区的发展经验，加强中国境外园区相互之间在发展模式、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以国际合作平台的定位不断提升园区发展水平。三是推动以“走出去”制造业集群为主体的产能合作，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实施一批高质量的产能合作项目，增强“数字”“绿色”项目引领，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形成示范效应，纠正东盟民众将产能合作认为是中国淘汰产能向外转移的偏误认知，提升东盟企业参与产能合作的意愿。

（四）提升供应链建设水平，保障产业链合作畅通。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加剧供应链的脆弱性，对产业链合作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加强供应链韧性是加强产业链合作的重要一环。一是构建重点产业供应链生态体系，引导我国供应链核心位置、关键环节、重要节点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企业，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力与控制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二是推动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与东盟国家建立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形成统一互认的供应链标准体系，促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高效运转，持续推进泛亚铁路网建设，有力支撑双方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升级。三是打造区域绿色供应链，利用火车运输的低碳优势，为企业提供国际运输绿色物流解决方案，以绿色物流加速推动区域供应链全过程的绿色化。四是打造区域数字供应链，依托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加强双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据赋能重点合作领域的供应链企业，提升关键业务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提高企业数字化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五是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在需求、供应、经营、制度等领域的供应链风险识别，建立安全评估和预警机制，实时监控对区域重要物流枢纽和通道资源的掌控情况，制定应急方案有效应对不确定事件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五）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产业链合作效率。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分工高度细化的产物，引领产业链现代化发展趋势。一是推动与“走出去”制造业集群的深度融合，针对性优化面向东盟的物流、金融、法律、咨询、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供给结构。二是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程度，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打造开放市场优势，在有序竞争中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更加优质服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三是建立双向人才培养交流机制，加快培养熟悉东盟国家的“技术+管理”高端化、复合型人才，支持企业依托人才交流项目开展员工的职业培训、海外轮岗等活动，加大对专业领域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四是打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平台，整合双方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积极建设中国—东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园区、公共平台，举办中国—东盟生产性服务业博览会，推动各类型平台嵌入双方产业链合作。

作者

蓝庆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武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央视网.合作迈上新台阶 我国将推动更多东盟国家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EB/OL].
https://www.cpn.com.cn/news/hg/202310/t20231011_1640692.html,2023-10-11/2023-10-22.

[2]外交部.中方推进“五大家园”建设进展报告[EB/OL].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202309/t20230906_11139347.shtml,2023-09-06/2023-10-22.